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尹志超 郭润东

【摘 要】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 幸福感 住房融资方式 共同富裕

【作 者】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润东(通讯作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 言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公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马述忠等,202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居民幸福感成为政府、社会大众以及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议题。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居民幸福感指数全球排第72名,比十年前(2012年第112名)明显提升,但仍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与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相类似,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增长并不同步,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等,2012;周绍杰等,2015)。系统考察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仅对理解居民幸福感变化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成因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家庭经济风险测度、成因及外溢性研究”(编号:21&ZD087)、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术新人项目“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编号:2022XSXR13)的阶段性成果。

住房是家庭必要的生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感(刘斌、张安全,2021)。已有研究表明,生活成本和购房压力会显著降低个人的幸福感(苏桂芳等,2013;冯明、赵佳涵,2022)。为缓解家庭购房压力,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成为近年来中国住房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陈选娟、林宏妹,2021)。200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在重庆、苏州等6个城市启动快递、外卖、家政服务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住房消费、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不仅是贯彻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举措,更是推进住房领域实现普惠共享的重要内容,对保障居民住房、落实中央“房住不炒”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康书隆等,2022)。由此可见,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施可能影响居民幸福感。

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性质和方向,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为居民购房提供支持,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住房拥有率(Tang等,2017),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进而降低就业水平(唐珏,2022),而且在客观上推动了房价上涨(顾澄龙等,2016)、拉大了公积金缴存家庭与非缴存家庭住房财富的差距(李涵、张昕,2020),由此可能对家庭主观福利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并不明朗。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对家庭主观福利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具体作用机制如何?是否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异质性?厘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政策效应、理解住房保障制度助力实现“为人民谋幸福”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和学术价值。

鉴于此,本文利用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深入考察其作用渠道和可能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有望为全面评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政策效应提供参考,对进一步改革完善相应制度提供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评述

幸福感是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罗必良等,2021)。已有大量文献从宏观或微观视角考察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其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主观福利效应的讨论尤为丰富。邓大松和杨晶(2019)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易定红和赵一凡(2021)评估了新农保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居民领取养老金能够显著提升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但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程名望和华汉阳(2020)的研究发现,“五险一金”中的“五险”均能显著提高居民幸福

感,且个人参保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主观幸福感越强。

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福利效应,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的住房福利和经济影响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关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中国家庭住房福利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部分研究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家庭提供低息贷款(康书隆等,2017),降低家庭购房融资约束(周华东等,2022),提升家庭住房拥有率,增加住房消费(Xu,2017)。例如,Tang等(2017)研究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较高、缴存年限较长的家庭有着更明显的福利促进效应。也有研究指出,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客观上推动了房价上涨(顾澄龙等,2016),导致居民住房财富差距拉大(李涵、张昕,2020)、扩大了缴存家庭与非缴存家庭的住房需求差异(何欣、路晓蒙,2019),损害了居民的住房福利。此外,还有研究强调,公积金贷款申请受限较多(陈选娟、林宏妹,2021),可能会增加家庭购房困难(Wang,2011);特别是在低收入人群(卢云鹤、万海远,2020)、非体制内就业者(Wang,2000)和进城务工人员中(祝仲坤,2016),相应问题尤为突出。

除对家庭住房福利的影响外,现有研究也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投资、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首先,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助于提高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份额。例如,陈选娟和林宏妹(2021)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通过提高户主的风险偏好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促进有房家庭进行风险金融投资。周华东等(2022)研究指出,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较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其风险资产持有比重。其次,有不少研究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过,这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强调,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制度,具有强制储蓄的性质;对购房能力较低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缴存住房公积金意味着家庭需要承受低利率“储蓄”对应的收益损失,由此可能抑制其消费(詹鹏等,2018)。另外,公积金运营的流动性限制通过购房信贷约束,也可能降低家庭的消费水平(康书隆等,2022)。与之相比,也有研究指出,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使个人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福利,从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卢云鹤、万海远,2020),促进家庭消费(康书隆等,2017)。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直接评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其可能原因包括,数据可获得性限制、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较晚使得其主观福利效应尚未受到关注。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本文从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住房融资方式、购房概率及消费水平的影响出发,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可能作用机制,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其二,本文从家庭住房资源、财务状况和就业特征等角度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类型家庭的主观福利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助于全面理解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具有参考价值。

三、数据、变量与识别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的主观福利效应,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和潜在异质性。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项目。该项目旨在收集微观家庭的金融信息,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设计,在全国29个省份开展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甘犁等,2013)。CHFS的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基本人口特征、社会及商业保险参保情况、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住房及房产状况、收入与消费特征、户主的主观幸福感等,调查信息丰富,数据质量较高。在2015、2017和2019年,实际调查的样本量分别为37 289、40 011和34 643户家庭。这些数据为本文评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本文的数据处理步骤如下:(1)将历次调查中个人、家庭和社区数据进行匹配,并将匹配好的3期样本跨期匹配、合并形成面板数据;(2)鉴于当前住房公积金制度仅在城镇地区实施,故将分析样本限定为城镇家庭样本,同时剔除核心变量信息缺失的案例,由此得到48 246个城镇家庭户的74 738条观测记录。CHFS追踪过程中部分家庭因搬迁、拒访等原因无法成功追访,为保证样本代表性,历次追踪调查针对未成功追访的样本在同一社区采取科学补样。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具有非平衡面板结构特征,样本中追踪2次和3次的家庭户占比分别为34.6%和27.3%。失访样本和成功追访样本的主要变量分布特征显示,二者在基本人口特征、社保、住房、财务状况等方面无系统性差异,为研究数据的可靠性提供了支持。利用这些城镇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以家庭户为分析单位进行实证研究。

(二) 变量

1. 家庭主观幸福感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幸福感,使用受访户主的幸福感来代理反映。采取这一测量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CHFS问卷仅询问了受访户主的幸福感,其二,户主在家庭中的特殊角色和重要性意味着,户主幸福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主观福利状况,较好地代理反映家庭幸福感(尹志超等,2019;尹振涛等,2021)。该变量的具体测量使用“总体来说,您目前幸福吗?”来收集信息,初始选项包括非常幸福、幸福、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5个类别。本文将户主回答“非常幸福”或“幸福”的界定为家庭幸福,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2. 家庭住房公积金缴存状况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家庭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陈选娟、林宏妹,2021),将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定义为家庭缴存公积金,赋值为 1;若家庭所有成员均未缴存公积金,则赋值为 0。此外,为探究缴存额度的可能影响,本文使用家庭所有成员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作为解释变量辅助衡量家庭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为了对本文分析样本中家庭户的公积金缴存情况有基本了解,表 1 展示了首次观测时样本家庭户中不同就业和收入特征的家庭公积金缴存状况。其中,正规就业是指家庭

表 1 不同特征的家庭缴存公积金的比例

变 量	非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	低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公积金缴存(%)	3.928	60.691	13.645	43.497
观测值	27294	20952	24111	24135

注:表中报告受访户样本在初次进入观测时的变量特征,追踪记录不重复统计。

中至少有一名成员签订了正规劳动合同,其余为“非正规就业”;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分别指家庭收入小于、大于等于样本家庭收入中位数。表 1 显示,分析样本中,非正规就业和低收入家庭公积金缴存比例分别为 3.928%和 13.645%,表明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已超出传统的正规就业群体,且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均有覆盖。因而,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般意义,能够有效反映不断完善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微观家庭主观福祉的效应。

3.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户主特征和家庭财务状况会影响家庭幸福感(尹志超等,2019;尹振涛等,2021),住房情况(刘斌、张安全,2021)、社会保障的可及性(邓大松、杨晶,2019;易定红、赵一凡,2021)、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且这些因素极有可能与家庭公积金缴存状况有关。因而,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考虑这些因素,以控制其可能的混淆效应。具体而言,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1)户主特征,使用户主的年龄、性别(1=男性,0=女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1=已婚,0=其他)、健康状况(“较同龄人,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1=健康,0=不健康)、是否为党员(1=是,0=否)、工作状态(1=有工作,0=未工作)来测量;(2)家庭特征,使用家庭规模、医疗保险(1=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0=无)、养老保险(1=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参加养老保险,0=无)、生产经营状况(“目前,您家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1=从事工商业经营,0=其他)、收入总额、净资产额、有无负债(1=有,0=无)、自有住房拥有情况(1=有,0=无)、相对收入来测量。其中,相对收入的测量方式参考罗楚亮(2009)的做法,以所在社区的家庭平均收入为参照,衡量分析样本中每个家庭的相对收入^①。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① 计算方法为,使用家庭 i 在第 t 年的收入与同一社区 c 的家庭平均收入之比取对数来表示,即 $Relinc_{it} = \ln(Y_{it}/Y_{ct})$ 。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N=48246)

变量名称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幸福	0.651	0	1
公积金缴存	0.286	0	1
户主年龄	52.600(15.190)	16	102
户主为男性	0.705	0	1
户主已婚	0.836	0	1
户主受教育年限	10.410(4.100)	0	22
户主有工作	0.585	0	1
户主健康	0.494	0	1
户主为党员	0.200	0	1
家庭规模	3.119(1.477)	1	20
医疗保险	0.938	0	1
养老保险	0.845	0	1
工商业经营	0.168	0	1
家庭收入(万元)	10.200(21.870)	0	729.000
相对收入	-0.868(2.143)	-12.440	4.619
家庭有负债	0.289	0	1
家庭净资产(万元)	134.500(983.400)	0	209958.000
家庭有住房	0.872	0	1

注:表中报告受访户样本在初次进入观测时的变量特征,追踪记录不重复统计。

表 2。从户主特征来看,初次观测时,分析样本中户主的平均年龄为 52.6 岁,83.6%的人已婚,这些结果与尹振涛等(2021)关于城镇家庭户主特征的分布基本一致。从家庭特征来看,初次观测时样本中家庭规模均值为 3.1 人,家庭收入均值为 10.2 万元,与样本期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家户规模(3.05 人)和城镇家庭平均收入(10.9 万元)接近,印证了本文所使用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样本中家庭参加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93.8%和 84.5%,表明样本中城镇家庭的社保参与率整体较高。

(三) 计量模型设定

考虑到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家庭幸福感”为虚拟变量,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设定如下:

$$Happiness_{it}^* = \alpha + \beta_1 HPF_{it} + \beta_2 X_{it} + \text{Prov}_j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Happiness_{it} = 1(Happiness_{it}^* > 0)$$

其中, $Happiness_{it}$ 表示家庭幸福感, $Happiness_{it}^*$ 是潜变量,当 $Happiness_{it}^* > 0$ 时, $Happiness_{i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HPF_{it} 表示家庭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分别使用是否缴存住房公积金和缴存金额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Prov_j 为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际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公积金缴存金额仅对有缴存行为的家庭取值有效,为保证研究的一般意义,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分析等内容主要使用是否缴存公积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点探讨家庭是否缴存公积金对幸福感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基于上述数据与方法,本文拟合的 Probit 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的估计结果

显示,在控制了户主和家庭其他特征、年份、省份后,公积金缴存情况对家庭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为 0.01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平均而言,相较于未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缴存公积金能够使家庭幸福的概率提升 1.3%,这一差异约相当于样本均值(0.651,见表 2)的 2.0%。模型 1 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的婚姻状况、人力资本等特征均对其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已婚、健康、党员身份者,家庭幸福感显著更高。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幸福感显著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年限较长者往往有更高的期望或追求,其幸福感可能因此而相对较低。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负债的效应则相反。这些结果表明,家庭资产负债情况对以户主为代表的家庭成员的主观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罗楚亮,2009;孙计领、胡荣华,2017)。值得一提的是,相对收入对家庭幸福感的效应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相对收入反映家庭在其社区的相对经济位置,隐含了家庭之间的社会比较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攀比压力或融入困境(Cheung, 2018),进而降低家庭幸福感。拥有住房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印证了以往的研究发现(李涛等,2011)。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但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并未对家庭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表 3 模型 2 进一步展示了使用公积金缴存金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拟合的模型结果。在控制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公积金缴存金额的对数对家庭幸福概率的边际效应为 0.026,这一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较高的家庭,幸福感显著更高。模型 2 中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和显著性与模型 1 基本一致,为本文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提供了支持。

综上所述,本文基准模型结果表明,作为“五险一金”重要组成部分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这一研究发现丰富了当前关于住房保障制度主观福利效应

表 3 公积金缴存情况影响家庭幸福感的 Probit 模型结果(N=74738)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公积金缴存	0.013*** (0.004)	
ln 公积金缴存金额		0.026*** (0.008)
户主年龄	-0.014*** (0.001)	-0.014*** (0.001)
年龄的平方	1.6E-4*** (7.0E-6)	1.6E-4*** (7.6E-6)
户主为男性	-0.023*** (0.004)	-0.024*** (0.004)
户主已婚	0.107*** (0.005)	0.106*** (0.005)
户主受教育年限	-0.004*** (0.001)	-0.003*** (0.001)
户主有工作	0.014*** (0.004)	0.015*** (0.004)
户主健康	0.107*** (0.005)	0.107*** (0.005)
户主为党员	0.052*** (0.005)	0.052*** (0.005)
家庭规模	-0.001 (0.001)	-0.001 (0.001)
医疗保险	0.010 (0.008)	0.010 (0.008)
养老保险	0.021*** (0.005)	0.023*** (0.005)
工商业经营	0.025*** (0.005)	0.024*** (0.005)
家庭收入	0.033*** (0.010)	0.035*** (0.010)
相对收入	-0.025** (0.010)	-0.026*** (0.010)
家庭有负债	-0.062*** (0.004)	-0.063*** (0.004)
家庭净资产	0.017*** (0.001)	0.018*** (0.001)
家庭有住房	0.019*** (0.006)	0.018*** (0.006)

注:回归模型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表中数值为边际效应及其检验结果,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的研究成果。

(二) 内生性问题讨论与矫正

1. 倾向得分匹配

现实中,缴存公积金的家庭可能与未缴存家庭在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由此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缓解基准回归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影响住房公积金缴存和家庭幸福感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变量纳入匹配模型,使用 Logit 模型估计家庭缴存公积金的条件概率,预测倾向得分。然后,使用倾向得分值进行 1:2 的近邻匹配和核匹配,计算匹配样本中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表 4 给出了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的估计结果。以近邻匹配结果为例,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043,在 1%的水平上显著。类似地,核匹配估计结果也显示公积金缴存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印证了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公积金缴存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

匹配方法	结果变量	实验组	对照组	ATT	标准误	t 值
近邻匹配	家庭幸福	0.679	0.636	0.043	0.013	3.250
核匹配	家庭幸福	0.692	0.636	0.056	0.011	5.100

注:仅对共同取值范围内的个体进行匹配。

2.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本文的分析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样本中存在部分追踪失败的被访者,这一数据特征可能会带来样本选择性偏差。为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自选择性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将分析样本限定在三期严格追踪的子样本中,由此形成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估计。由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公积金缴存效应反映样本期内公积金缴存状态发生变化的家庭的相应效应。在分析样本中,考察期内住房公积金缴存状态发生变化的家庭样本量为 651 户,占分析样本总量的 3.2%。表 5 模型 4 的估计结果显示,公积金缴存变量的边际效应为 0.035,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缴存公积金使家庭幸福的概率提升 3.5%,这一效应印证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主观福利效应,即城镇家庭缴存公积金能够显著提升其家庭幸福感,因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5 公积金缴存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FE(N=20367)

变 量	模型 3	模型 4
公积金缴存	0.036*(0.019)	0.035*(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注:模型中控制了年份、家庭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同表 3。括号内为家庭层面聚类标准误。

3. 工具变量法

尽管本文基准模型控制了一系列在理论上重要、可能产生混淆效应的因素,如家庭收入、负债、住房情况、社保参与等特征,不过,模型中可能依然存在未观测的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问题。为检验相应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借鉴 Acemoglu 等(2019)的

思路,使用特征相似的组群内其他家庭的平均公积金缴存率作为工具变量。组群的界定方式参考周华东等(2022)的做法,以户主年龄(分为45岁以下、45~65岁和65岁以上3组)、受教育年限(分为9年以下、9~13年和13年以上3组)、所在区域(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3组)3个变量的交乘构造了27个组群,计算每个家庭所在组群(除自身外)其他家庭的公积金缴存率均值。由于同侪效应的影响(Araujo等,2010),样本家庭是否缴存公积金与组群内其他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密切相关,因而满足相关性条件。另外,组群内其他家庭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并不会直接影响样本家庭的幸福感,因此满足外生性条件。

表6给出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其中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SLS和IV-Probit进行估计。工具变量法一阶段回归相关统计检验表明,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与公积金缴存变量显著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缴存公积金对家庭幸福感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这为本文基准模型拟合结果的稳健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表6 公积金缴存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工具变量法(N=74738)

变 量	模型5	模型6
公积金缴存	0.075*** (0.021)	0.062*** (0.021)
一阶段F值	3923.850	3923.850
一阶段工具变量T值	62.640	62.640
DWH检验	8.827***	
Wald检验		33.170***

注:模型中均控制了户主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同表3。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如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五、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检验

本文理论分析部分从学理上探讨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为实证检验相应作用机制,表7至表9分别针对住房融资方式、购房概率和家庭消费行为拟合模型,以探讨住房公积金缴存状况对这些机制变量的作用。

1. 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提供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方式

在中国,相较于商业住房贷款和民间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居民提供较低利率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从而缓解家庭住房融资约束与还贷压力,由此有助于提升家庭幸福感。

为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住房融资方式的影响,表7针对调查时仍有未还清住房贷款的家庭,拟合贷款类型的IV-Probit

表7 公积金缴存对住房融资方式的影响:IV-probit(N=5514)

变 量	模型7 公积金贷款	模型8 商业贷款	模型9 民间贷款
公积金缴存	0.217*** (0.081)	-0.377*** (0.099)	-0.014* (0.008)

注:控制变量同表3。

模型。模型 7 的估计结果显示,公积金缴存显著提高了有房贷家庭的房贷类型为公积金贷款的概率,相应边际效应为 0.217,意味着相较于未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概率高 21.7%。类似地,模型 8 和模型 9 的结果显示,相较于未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缴存公积金的家庭选择商业住房贷款的概率低 37.7%,选择民间贷款的概率低 1.4%。综上所述,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购房融资方式,有助于缓解家庭购房融资约束和还款压力。结合以往研究发现的住房融资约束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李涛等,2011),可以推断,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为家庭提供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方式,有助于提升家庭幸福感。

2. 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提高家庭购房概率

已有研究发现,拥有住房能够显著提升个人的幸福水平(李涛等,2011)。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可能通过提高家庭未来购房概率,影响家庭幸福感。为检验相应作用机制,本文拟合了缴存公积金对家庭购房计划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未来是否有购房计划,分别使用 Probit 和 IV-Probit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8 模型 10 和模型 11 所示。以模型 11 的

表 8 公积金缴存对家庭购房概率的影响(N=74738)

变 量	模型 10	模型 11
公积金缴存	0.029*** (0.003)	0.089*** (0.017)

注:控制变量同表 3。

估计结果为例,缴存公积金对家庭购房计划的边际效应为 0.089,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较于未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缴存公积金使家庭有

购买住房计划的概率提高 8.9%。结合现有国内外文献发现的家庭拥有住房对幸福感的促进效应(李涛等,2011;Syed,2016),以上分析支持了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提高家庭未来购房概率进而有可能提高家庭幸福感。

3. 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并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文化娱乐等享乐型消费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胡荣华、孙计领,2015)。基于此,本文从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出发,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影响消费对家庭幸福感的可能作用。家庭消费水平的测量使用家庭食物、衣着、家庭设备服务、居住、通信交通、文娱教育、保健医疗和其他消费的总和取对数,消费结构使用恩格尔系数,即家庭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针对这些变量拟合 2SLS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9。结果表明,相较于未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消费水平高 20%(=e^{0.184}-1),家庭恩格尔系数则低 2.7%。这些结果意味着,住

表 9 公积金缴存对家庭消费水平及结构的影响:
2SLS(N=74738)

变 量	家庭消费	恩格尔系数
公积金缴存	0.184*** (0.013)	-0.027*** (0.004)

注:控制变量同表 3。

房公积金制度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降低恩格尔系数进而改善消费结构,由此产生提升家庭幸福感的效应。

(二)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的住房公积

金制度存在政策性差异(周华东等,2022),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面临不同程度的限制(康书隆等,2022),有房家庭和无房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约束条件差异明显(陈选娟、林宏妹,2021),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因此而存在异质性。深入分析缴存住房公积金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有助于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际效用及其公平和效率问题,从而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从家庭住房特征出发,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及无房家庭、首套房与多套房家庭、有房有贷和有房无贷家庭幸福感影响的差异^①。表 10 模型 12 和模型 13 的估计结果表明,公积金缴存显著提升了有房家庭的幸福感,对无房家庭的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模型 14 和模型 15 显示,公积金缴存对首套房家庭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多套房家庭则无显著影响。模型 16 和模型 17 的估计结果表明,公积金缴存对有房有贷家庭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有房无贷家庭的幸福感无显著影响。结合以往研究发现的住房贷款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康书隆等,2017),这一结果支持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缓解房贷压力、提升有房贷家庭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表 10 住房异质性:IV-Probit

变 量	模型 12 有房	模型 13 无房	模型 14 首套房	模型 15 多套房	模型 16 有房有贷	模型 17 有房无贷
公积金缴存	0.046*(0.023)	0.107(0.067)	0.057**(0.023)	0.058(0.042)	0.167**(0.081)	0.018(0.024)
观测值	66018	8720	52302	13716	8127	57891

注:模型中未控制家庭自有住房,其余控制变量同表 3。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产生主观福利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中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其初衷是解决居民首套住房问题,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上升为首套房利率的 1.1 倍^②。由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购买非首套房提供的贷款利率优惠会明显降低,不难理解该制度对多套房家庭幸福感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对于有房有贷家庭而言,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为家庭提供较低成本的购房融资方式,缓解家庭还贷压力(周华东等,2022),因此对家庭幸福感产生正向效应。

六、进一步讨论

上文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家庭主观福利。然而,住房公积金作为一项具有长期性、互助性质的住房保障制度(陈选娟、林宏妹,2021),在为家庭提供低贷款利率福利、保障家庭住房需求的同时,制度的公平性值得关注。为此,本文尝试进一步

① CHFS 问卷有关住房贷款的问题为:“当前,您家是否因购房有尚未还清的银行贷款?”若当前家庭因购买住房有尚未还清的贷款,则定义为有房贷家庭,否则为无房贷家庭。

②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住房公积金 2021 年年度报告》。

探讨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群体带来的效用差异,了解其对相对弱势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从而为深入理解该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一)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财务状况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世界银行《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指出,“共享繁荣”意味着,要使每个国家最贫穷的40%的人口实现年均收入增长、幸福感提升。换言之,关注财务状况较差群体的幸福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针对分析样本中家庭人均收入、消费或资产在40分位数以下(即财务状况较差的)及以上(含40分位点,财务状况较好的)家庭,分别考察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其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11。结果显示,相较于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对人均收入、消费或资产在40分位数以下的家庭(分别对应模型18、模型20和模型22)幸福感促进效应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对于收入、资产以及消费在40分位数以下的家庭,其购房面临的压力更大。结合本文机制分析结果,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家庭提供较低成本的购房融资,极大地缓解了家庭购房压力。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财务状况较差的家庭带来更高的效用,显著提高其幸福感。从这一意义上讲,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繁荣的目标。

表 11 公积金缴存对不同财务状况家庭幸福感的影响:IV-Probit

变 量	模型 18 收入 40 分 位数以下	模型 19 收入 40 分 位数及以上	模型 20 消费 40 分 位数以下	模型 21 消费 40 分 位数及以上	模型 22 财富 40 分 位数以下	模型 23 财富 40 分 位数及以上
公积金缴存	0.085*** (0.017)	0.041*** (0.012)	0.065*** (0.016)	0.047*** (0.013)	0.100*** (0.017)	0.036*** (0.012)
观测值	29768	44970	29895	44843	29895	44843
系数差异 P 值	0.031		0.011		0.057	

注:本文分析样本中,人均收入、消费及资产40分位数以下的家庭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分别为12.9%、17.4%和14.8%。似不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分组系数差异显著。模型18和模型19未控制家庭收入,模型22和模型23未控制家庭资产,其余控制变量同表3。

(二)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经济脆弱性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当前中国已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在共同富裕与共享繁荣的道路上,经济脆弱性家庭成为亟须关注的对象。为此,本文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经济脆弱性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从流动性约束和家庭偿还住房贷款的能力两个角度衡量家庭经济脆弱性,其中,流动性约束的定义参照Zeldes(1989)的做法,将全年金融总资产低于两个月永久收入的家庭定义为具有流动性约束的家庭。针对不同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本文分别拟合回归模型检验缴存住房公积金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同时控制了家庭是否有住房贷款,估计结果见表12模型24和模型25。结果表明,缴存住房公积金对具有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本文对样本中有未还住房贷款的家庭估算了其住房贷款还贷能力。按照银监会对商业银行房

表 12 公积金缴存对不同经济脆弱性家庭幸福感的影响:IV-Probit

变 量	模型 24 流动性约束家庭	模型 25 非流动性约束家庭	模型 26 房贷压力较大	模型 27 房贷压力较小
公积金缴存	0.088*** (0.031)	0.030 (0.030)	0.186* (0.099)	0.149 (0.142)
住房贷款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8339	36399	5364	2787

注:控制变量同表 3。

地产贷款风险控制的规定,借款人每月需还贷金额与收入比值达到 40%意味着进入还贷压力警戒线^①。本文将平均每月房贷占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大于 40%的家庭定义为房贷压力较大的家庭,其余有房贷家庭为房贷压力较小的家庭。对两类家庭分别拟合模型,结果如表 12 模型 26 和模型 27 所示。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对偿还住房贷款压力较大的家庭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断,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经济脆弱性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不同就业状况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最后,相较于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就业者通常面临社会保障水平低、购房压力大、工作稳定性差、工资收入低等问题,因此,从事非正规就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可能显著更低(丁述磊,2017)。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特别关注非正规就业群体。2005 年发布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现实中非正规就业者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否提高其主观幸福感仍有待检验。本文借鉴丁述磊(2017)的做法,将家庭中所有成员均未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定义为非正规就业家庭。表 13 给出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对非正规就业家庭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显著更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非正规就业家庭带来更高的效用,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表 13 公积金缴存对不同就业状况家庭幸福感的影响:IV-Probit

变 量	非正规就业	正规就业
公积金缴存	0.055* (0.028)	0.013** (0.006)
观测值	43218	31518
系数差异 P 值	0.034	

注:似不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分组系数差异显著。模型中控制变量同表 3。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 2015、2017 和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全面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制

①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

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其作用机制包括:(1)为家庭提供低成本购房融资方式,缓解家庭购房融资约束及还贷压力;(2)提高家庭未来购房的可能性;(3)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改善家庭消费结构。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提升家庭幸福感的主观福利效应。对不同房产状况的家庭,住房公积金制度产生的主观福利效应差异明显,缴存住房公积金对有房、首套房、有房有贷家庭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大。此外,住房公积金制度对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提升效应尤为明显,由此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扩大制度的普惠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尤其对相对弱势群体的幸福感提升作用更大。考虑到目前仅成都、重庆、常州、苏州、广州、深圳等地实行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为使更多居民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红利,应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范围,探索自愿缴存与强制缴存相结合的机制,使更多家庭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福利。

第二,改进住房公积金使用机制,增强居民幸福感。本文研究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未显著改善无房和有房无贷家庭的幸福感。对于无房和有房无贷家庭而言,由于无法享受住房公积金低贷款利率福利,制约了其对当前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幸福感的提升。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改进住房公积金使用机制,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公平性考虑,增强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

第三,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提高服务效能。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缓解居民购房压力,保障住房水平。本文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能够为家庭提供低成本贷款方式,提高家庭未来购房概率,从而有助于提升家庭幸福感。然而,在不少地区还存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手续烦琐、异地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受限较多的问题,限制了部分有需求的居民实际办理公积金贷款。因此,进一步精简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和手续,提高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服务效能,有望助力“为人民谋幸福”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选娟、林宏妹(2021):《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4期。
2. 程名望、华汉阳(2020):《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3. 邓大松、杨晶(2019):《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4. 丁述磊(2017):《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经济

- 与管理研究》,第4期。
5. 冯明、赵佳涵(2022):《物价房价、预期与居民幸福感》,《财贸经济》,第7期。
 6. 甘犁等(2013):《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金融研究》,第4期。
 7. 顾澄龙等(2016):《住房公积金制度、房价与住房福利》,《经济学(季刊)》,第1期。
 8. 何欣、路晓蒙(2019):《公积金制度加剧了中国住房不平等吗?》,《社会保障研究》,第2期。
 9. 胡荣华、孙计领(2015):《消费能使我们幸福吗》,《统计研究》,第12期。
 10. 康书隆等(2022):《购房借贷约束与缴存家庭消费——基于公积金运营流动性视角的分析》,《金融研究》,第3期。
 11. 康书隆等(2017):《住房公积金、购房信贷与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第8期。
 12. 李涵、张昕(2020):《住房公积金导致了不平等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13. 李涛等(2011):《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经济研究》,第9期。
 14. 刘斌、张安全(2021):《有产者的就业焦虑:安居真的可以乐业吗——基于城市住房分层与工作满意度的观察》,《财经研究》,第1期。
 15. 卢云鹤、万海远(2020):《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学(季刊)》,第5期。
 16. 罗必良等(2021):《赋权、强能、包容: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管理世界》,第10期。
 17. 罗楚亮(2009):《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财经研究》,第11期。
 18. 马述忠等(2022):《电子商务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共同富裕视角》,《计量经济学报》,第3期。
 19. 苏桂芳等(2013):《食品价格上涨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20. 孙计领、胡荣华(2017):《收入水平、消费压力与幸福感》,《财贸研究》,第2期。
 21. 唐珏(2022):《降低住房公积金缴费率有助于稳定就业吗?》,《经济学(季刊)》,第3期。
 22. 易定红、赵一凡(2021):《新农养老金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6期。
 23. 尹志超等(2019):《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与家庭幸福》,《金融研究》,第4期。
 24. 尹振涛等(2021):《金融科技发展能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吗?——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25. 詹鹏等(2018):《住房公积金与居民收入分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26. 周华东等(2022):《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6期。
 27. 周绍杰等(2015):《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第6期。
 28. 祝仲坤(2016):《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困境摆脱”》,《改革》,第7期。
 29. Acemoglu D., Naidu S., Restrepo P., et al. (2019),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1):47-100.
 30. Araujo C., de Janvry A., Sadoulet E. (2010), Peer Effects in Employment: Results from Mexico's Poor Rural

Communities.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Revue canadienne d'études du développement*. 30 (3-4):565-589.

31. Cheung F. (2018), Income Redistribution Predicts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5(5):867-882.

32.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et al.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5):9775-9780.

33. Syed H A. (2016), Happiness and House Prices in Canada:2009-201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5(2):57-86.

34. Tang M., Coulson N E. (2017), The Impact of China'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n Homeownership,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Housing Invest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63:25-37.

35. Wang Y P. (2000), Housing Reform and Its Impacts on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Housing Studies*. 15(6):845-864.

36. Wang S Y. (2011), State Misallocation and Housing Pr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5):2081-2107.

37. Xu Y. (2017), Mandatory Savings, Credit Access and Home Ownership: The Case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Urban Studies*. 54(15):3446-3463.

38. Zeldes S P. (1989), 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2):305-346.

The Effects of Housing Provident Fund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Yin Zhichao Guo Rundong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HPF) on family members' wellbeing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re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HPF system.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HPF on family memb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viewing from the household head's self-reports, using data from the 2015-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We find that contributing to the HPF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family memb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is remains robust after correcting for estimation bias due to sample self-selection and endogeneity issues. The HPF system provides low-cost housing finance,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 ownership and improv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ereby increasing one's subjective wellbeing.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the HPF system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ose owning a house, with only one house, and those paying house mortgage.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PF system significantly improves individuals' wellbeing in households facing poorer financial conditions, economically vulnerable or employed informally, which therefore contributes to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provides micro evidence that the HPF system improves 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throws lights on related policy intervention.

Keywords: The Housing Provident Fund; Happiness; Housing Financing Methods;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牛建林)